

City Life

何文郁译

城市生活

City Life

[澳] 阿德里安·富兰克林 著

何文郁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生活 / 张鸿雁、顾华明主编.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 11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书名原文: City life

ISBN 978 - 7 - 5499 - 3643 - 4

I. ①城… II. ①张… III. ①城市文化—研究 IV.
①C912.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8050 号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Adrian Franklin, 2010.

- 书 名 城市生活
著 者 [澳]阿德里安·富兰克林
译 者 何文郁
责任编辑 陈彦理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厂 址 江苏省南京市新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 399 号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30 000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99 - 3643 - 4
定 价 40.00 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taobao.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sfhjy>
邮购电话 025 - 85406265, 845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 - 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序

张鸿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类城市化的发展既有共同规律，也有不同国家各自发展的特殊道路和独有特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当一个人已在一种独特的文明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并经常试图找到这种文明的源头及其所由发展的道路的时候，他有时也禁不住朝另一个方向侧瞥上一眼，询问一下该文明未来的命运以及它注定要经历什么样的变迁。”^① 经典作家认为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动力，全球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和历程证明，凡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也基本是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例外。^② 同样，中国以往的城市化历史经验也证明，要想使作为国家战略的中国新型城镇化能够健康发展并达到预期目标，就必须总结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文明》，徐洋、何桂全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1。

^② 张鸿雁、谢静，《城市进化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与治理创新》。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特别要择优汲取西方城市化的先进理论和经验以避免走弯路。^① 我研究城市化和城市社会问题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借此机会把我以往积累的一些研究成果、观点和认识重新提出来供读者参考。

一、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反思与优化选择

2013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52%，正在接近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中国成为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关键是，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将仍然处于继续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而且仍然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转型的社会变迁期。这一典型的社会变迁——中国新型城镇化关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和质量以及社会的公平问题。

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方面，如城市空间正义理论、适度紧缩的城市发展理论、有机秩序理论、生态城市理论、拼贴城市理论、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花园城市理论、智慧城市理论、城市群理论以及相关城市规划理论等，这些成就对人类城市化的理论有着巨大的贡献，在推进人类城市化的进化方面起到了直接的作用。中国城市化需要在对西方城市化理论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西方城市化理论进行扬弃性的运用，从而最终能够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体系与范式。

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我们解决的手段却越来越少，甚至面对有些问题我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为什么会这样？即使在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的西方国家，在当代仍然存在着普遍的和多样化的社会问题^②，而且在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也都

^① 张鸿雁，“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社会学研究》，2013.3。

^② 参见张鸿雁，《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城市可持续创新战略》。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集中在城市，形成典型的“城市社会问题”。如城市贫困、城市就业、城市住房、城市老人社会、城市社会犯罪、富人社区与穷人社区的隔离、城市住区与就业空间的分离、城市中心区衰落以及城市蔓延化等问题，甚至有些在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已经解决的社会问题，仍然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社会中不断发生。这些现象的发生，与我们缺乏对西方城市化理论与模式的全面理解与择优运用有关。

在建构中国本土化城市理论的过程中，对外来城市化理论进行比较地、批判性地筛选，这不失为一种谨慎的方式。西方城市化发展过程所表现的“集中与分散”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创新形成的，可以描述为高度集中与高度分散的“双重地域结构效应”。^① 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高度集中，与美国近80%左右的人居住在中小城镇里的高度分散，就是这种“双重地域结构效应”的反映。西方城市化理论是以多元化和多流派的方式构成并存在的，既有强调城市化“集中性”价值的一派，亦有强调城市化“分散化”价值的一派，还有强调集中与分散结构的流派。回顾以往，在某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则把西方城市人口集中的流派作为主要的理论核心模式，如果21世纪初的城市化仍然把城市高度人口集中作为主导，这不仅是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误读，更是对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严重误导。而事实上，中国通过“制度型城市化”的创造，以西方城市化理论中的集中派理论模式为“模本”，形成了高速与高度集聚的畸形城市化——中国式“拉美经济陷阱”^②。过度集中和过度集权的城市化成为导

① 张鸿雁，《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② “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南美洲巴西等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贫困人口却占国家人口总数的34%。一方面是经济较快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趋势；一方面是社会有所富裕，另一方面却是贫困人口增加……在其总人口中有相当规模的人口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参见：王建平，“避免‘拉美陷阱’”，《资料通讯》，2004(4)，46。

致“都市病”深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从基本国情的角度讲，仅适于美国等人少地多国家的“城市过度造美运动”以及大尺度、大规模占用土地资源的城市化，推行到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中国是基本不可行的，从长远利益角度来认识、分析这种现象，这是一种破坏性建设。

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中，还有些成果要么是戏剧化的，要么是过于理想化的——从乌托邦的视角提出城市化的理论，被喻为“要构建一个虚拟的理想世界”^①，在学理性和科学性方面缺乏社会实践基础，在创造理想模式方面的价值大于实际应用价值。当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创造“理想类型”，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空间来加以探讨和完善。西方城市化理论与世界任何理论一样，有其合理内核，亦有典型的历史与现实局限，必须认真选择，优化运用。

二、中西城市化发展的差异认知

与西方城市化“动力因”相似的是，中国城市化的外在形式也是以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但是，除此而外，中国城市化在发展“动力因”的构成与序列上，非但不同于西方，而且还有着强烈的本土化“制度型动力体系”构成特点，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通过“政府制度型安排”形成高速的城市化。所谓“制度型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城市化与城市战略的规划是政府管控的；二是城市化与城市建设的投资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三是城市化的人口发展模式是政府规划的；四是城市的土地是由政府掌握的，等等。这一动力模式具有强大的权力力量的优势，同时也具有典型的行政命令的弱点。中国城市化以三十多年的时间跃然走过了西方两百年的城市化路程，成就令世界瞩目，

^① 尼格尔·泰勒，《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李白玉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24~25。

但城市社会问题也越来越深化——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城市化原动力不足、动力结构不合理的事实，其主要症结在于中国没有本土化的科学的都市理论来引导。

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制度体系结构与个体价值观、人口总量与结构、教育水平与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表现在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和发展水平方面，同时还表现在文化的总体价值取向方面。西方的资本主义承袭了古典时代思想，并且是从中世纪的土壤中“自然长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长入”的方式显现了西方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逻辑，在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机制内，使得在城市化中出现的社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文化结构转型，能够基本处于同步进化的结构变迁之中，没有出现典型的“社会堕距”与“文化堕距”。这些证明了西方城市化发展的市场规律运性表现。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以来，中西方城市化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两种城市化形态的社会前提、进程、节点和社会结构都是不同的。

西方城市化早期的历史是“双核动力发展模式”，即“城市经济”与“庄园经济”构成“双重动力”，城市工商业和庄园手工业并行发展，中世纪从庄园里逃亡出来的手工业者，较快地转入了工业化的大工业生产。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也可以完整解释为“双核地域空间模式”。而中国是典型的集权的传统农业社会，可以解释为“单核地域空间模式”，城市在汪洋大海般的农业社会中生存，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土地关系和契约关系，由此产生的城市化“与传统农村有千丝万缕联系”，及至当代仍然是尚未与传统乡村“剪断脐带”的城市化。这一轮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在土地制度上有所突破，进行中国式的“第三次土地革命”^①，只有这样才能融入世界城市化和全球一体化浪潮之中。

^① 张鸿雁，“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与第六次城市革命”，《城市问题》，2008.1。

三、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经历了多种形式的城市社会结构变迁过程^①，这种变迁在总体上是一种社会进步型的发展。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是这一变迁的继续，我们不难看到，在城市化的进化型变迁中，在解决传统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这是符合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没有不存在问题的社会，亦如发展本身就是问题，现代社会就是风险社会的命题一样，社会存在本身就是问题。因当代中国的城镇化具有历史的空前绝后性，其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繁杂：有些是传统社会问题，即没有城镇化也存在；有些是城镇化引发和激化了的问题，要梳理出关键点加以解决。

“当我们渐近 20 世纪的尾声之时，世界上没有一个这样的地区：那里的国家对公共官僚和文官制度表示满意。”^② 这是美国学者帕特里夏·英格拉姆在研究公共管理体制变革模式时的一段论述。正因为如此，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进行制度改革，只是改革的方式和声势不同，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把改革与创新作为同一层次的认知方式，而不是把改革作为一种运动的方式。亨廷顿曾有针对性地对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提出这样的分析：“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面临着“政党与城乡差别”的社会现实，事实上中国的改革面临的社会现实正是“城乡差异”二元结构深刻的特殊社会历史时期，当代的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都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有关。他认为：“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和城市人口增长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

^① 张鸿雁等，《1949 中国城市：五千年的历史切面》。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② 《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39。

给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中国城乡差别的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型城镇化战略就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建构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城市市民社会。

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说：“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事实。”^①人类伟大的文化总是属于城市的，这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人们对城市向往的原因所在。对于城市的“伟大”认知不止于斯宾格勒，早在中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在1588年出版的《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一书就提出了“城市伟大文化”的建构与认知。他对城市的评价是这样的：“何谓城市，及城市的伟大被认为是什么？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则被认为并非其处所或围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人们现在出于各种因由和时机移向那里并聚集起来：其源，有的是权威，有的是强力，有的是快乐，有的是复兴。”^②我惊叹于四百多年前的学者能够对城市有如此独到而精辟的论述，虽然这种论述包含着对王权价值的认同，但论者能够从独立的视野中发现城市的价值实是难能可贵。而且，四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也充分证实了这种美誉式的判断。同样，也是在四百多年前，乔万尼·波特若还提出了创造城市伟大文化的方式与入径：“要把一城市推向伟大，单靠自身土地的丰饶是不够的。”^③城市的发展、建设和再创造，要靠城市公平、开放和创造自由。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的出版目的十分明确：我国的城市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西方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或是可以善加利用的工具，

①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9。

② 乔万尼·波特若，《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刘晨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③ 同上。

有助于形成并完善我们自己城市理论的系统建构。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新型的城镇化过程中，避免西方城市化进程中曾出现的失误。新型城镇化是在建立一种新城市文明生活方式，是改变传统农民生活的一种历史性的改变。“新的城镇，也会体现出同社会组织中的现代观念有关的原则，如合理性、秩序和效率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城镇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学校。”^①

该丛书引进西方城市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大致涵盖了相关领域的重要主题，它以新角度和新方法所开启的新视野，所探讨的新问题，具有前沿性、实证性和并置性等特点，带给我们很多有意义的思考与启发。

学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城市化实践经验，研究发达国家新的城市化管理体系，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功能。但是，由于能力有限，丛书一定会有很多问题，也借此请教大方之家。读者如果能够从中获取一二，也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张鸿雁：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院长
中国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会长
(2013 年 11 月于慎独斋)

^①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 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19。

献给艾伦和菲力普

前言

轰炸后遗留下的废墟残存了几十年，大自然迅速地接管了它们，崩塌的房子，丛生的柳叶菜和醉鱼草在那些断壁残垣上攀爬……废墟的周遭充斥着流浪的猫，当炸弹肆虐时，那些逃离的猫再也没有看见过家园，房屋和主人都不在了。老太太们给它们喂食，之后它们生息繁衍并变得数量庞大，但它们不会痴迷于被抚摩的感觉了。

——Fay Weldon, *Auto Da Fay*, 2002: 157

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我们的生活就是城市生活。本书探究的更多是城市生活，而不是结构、建筑、政策、体制、人类分类学以及社会学这些常规构成城市研究的内容。所有这些毫无疑问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但事实上也仅是一部分而已。城市研究的描述性传统有一种趋势，往往将城市简化为对系统的抽象，无论是社会系统还是物理系统（遗憾的是，很少有两者结合的情况），简化为对城市的成和败的经验主义描写（进步和丑闻的记分卡），简化为城市假定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浩如烟海的城市研究、城市知识和城市感知的推手），最重要的是，简化为绝大多数是单向度的、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虽然我无比愉快地注意到阿敏 [Amin] 和思里夫特 [Thrift] 的《城市——重新想象的都市》[*Cities-Reimagining the Urban*, 2002]），这里存在一种趋势，在我看来是一种严重趋势，就是复制了与科学及人文科学之间的大分化（the Great Divide）相关

的所有问题。因此，我们会创作出一些有关城市的作品，用以强调城市的一个人类或非人类的特征（它的文化、建筑、建筑风格、交通，它经受的自然灾害，它的空气质量以及住房标准），很少将城市当作这些事物的集合来处理；我们也很少把城市看作一个人类和非人类网络的总体，其中包含着文本、软件、文化、行为、建筑风格，还有绿树和花园。因此，对城市生活发表有意义的看法事实上极为困难。在我们生活方式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城市生活必定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变量，它影响着社会关键劳动者与雇员的定位。由于既关注环境和生态状况，也关注文化、服务、建筑和气氛（我们也的确常常听到喧嚣、氛围、“活力”和刺激等），他们对生活方式的考量跨越了大分化。我们听说成功的城市是宽容的城市，但这种宽容并不仅仅是针对文化和种族的：它是一种普遍的宽容，一种对诸如此类事物的真正兴趣和关心，例如：自然、过去、杂合、新（旧）科学技术、内地与邻国、我们衣食的生产者、我们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本书提出，所有这些后物质主义与后人文主义的主题，构成了当代西方以及其他正在现代化的城市的新的生态文化。

即使我们并不生活在大城市之中（虽然世界越来越城市化），我们所有人也生活在它的阴影里，被它的引力束缚在某些地方，事实上，在我们生活的某些特定时刻，我们大多数人都渴望生活在它的魔力之下。城市生活有许多魔法、幻景、仪式和超越性的内容，但它们在城市研究中仅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会浮现出来（有一个例外，见 Pile, 2005），但如果我们想要正确彻底地了解城市生活，它们又相当关键。我们中有很多人渴望离开养育我们的地方——这里安全、能把握但又单调而乏味（例如郊区、小镇和乡下的落后地区）——向着城市之光进发；我们向往天天把时间在城市中购物，那儿的商店更好，售卖的物品也令人目眩神迷。它们所拥有的给予人们一种别处无法获得的审美活力。还有一些杰出的公共艺术和建筑作品，它们在询唤我们的同时也在向我们致意，无论它们是否是国家建造的圣殿，或是否体现了

艺术或流派的运动，或仅仅是一个名人地标。这些事物通过数不清的方式来定义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走向何方。而且，我们越来越需要使我们自己沉浸于城市的转型氛围之中，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而言，城市还承诺我们实现自己的潜能，不论这是否可能；在外面的一个地方能找回自己，这个地方传统与保守的文化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城市即实验和自我塑造的场所。本书是关于城市（或至少大多数城市）是如何成为我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元素，以及它们为什么要以现有的形式存在。

谁能怀疑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巨大的小黄瓜（Gherkin）或者皮亚诺（Piano）所期望的玻璃碎片大厦（Shard of Glass）对伦敦天际线建设性的定位？我们向往城市的剧场、音乐和文化作品，并对城市的名人与天才表示敬意。我们也渴望城市提供给我们的潜能和多种可能性，为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塑造我们自己。城市生活中有许多创新，既有人类的也有非人类的：我喜欢这一类的想法——城市农场，城市森林，学会了巡视它的那片天空及高高筑巢的鹰，还有在花园的工具棚之下养育家人的狐狸和獾。

如果村庄、社区和郊区为我们提供了用以遵守和追随的规范，那么城市则为我们提供了多种选择、多条道路以及多元变化。如果小地方的社群和归属感为我们提供了判断力和确定性，那么，就如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1997b）所说的，城市会提供探索的自由和对未知世界眼花缭乱的冒险。

矛盾的是，我刚刚所说的一切都是在被广泛认同之时也充满着争议，不过更主要的还是充满争议。和现代性的大多数时候一样，最近一些年，城市受到某些十分尖锐的批判。它被迫为许多坏事情承担责任：从传统、社区、家庭的破坏到失范、个人主义、厌世的世界大同主义、消费主义和市场化的兴起，到对有利于人类自身的自然界的剥夺和破坏。城市眼看着吞并了它们的腹地和疆域。城市上班族成了一个对未开发地区和传统乡村的毁灭性诅咒；他们对自然与流动性相结



图 0.1 一个令人激动的城市：澳大利亚悉尼。(photo Adrian Franklin)

合所怀有的自相矛盾的热忱，持续地威胁着荒芜的边境之地。对于厄运的来临，有一种普遍的预感：那就是这个世界可能会在某一天变成一个总体城市（totalopolis）。

然而在所有这些恐惧中，城市也不过是一个新的替罪羊，一个用以储藏我们对于变化的恐惧和不安全感的仓库。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城市，我们也将会看到令人激动的潜力，纯粹的可能性，延展的能力，它并不全是厄运。

那么，城市是宏伟而且充满刺激的地方，而且在我眼里这种宏伟和刺激只会增多不会减少。整个世界，城市都在人与文化的多样性中不断发展，城市比其他任何空间更多地以这些方式从全球化中获益。城市的移民通常会保持他们多样的文化和种族形态完好无损，和他们来到城市之前几乎一模一样。父母们沿袭着昔日的方式、故国的做法和规则。当然，为什么不呢？但是最终，他们的儿子乃至孙辈们会厌倦作为他者，即使当城市只不过是他的混合地时也是如此。他们也

常常想搭现代时代精神的顺风车，成为现代新纪元的一部分，而逐渐展开的现代性很少倾向将传统和种族性当作一种不变的形式来保存。典型的是恰好相反：创造混杂的世界，混合的口味，消融差异，而同时对此做法持普遍的宽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城市过于复杂多变而难以保持静止；它们必须处在永不停息的变迁之中，不停地化为其他事物，其他更好的事物（但愿如此）。毕竟，固守时代和文化的一成不变是与城市生活精神相悖的。因此，多元性成了融合的没有止境的未来。文化不会在城市间消失，它们彼此渗透。在它们这么做的时候，我正在考虑把黑人文化通过爵士乐得以融合的历史当作一个范例，文化没有消失但转变了，它们挑战并创造了融合与汇聚——常常是以令人震惊且难以预料的方式。

例如，我们都在使用、戏耍并改变着英语的用法；我们都随着起源于与故乡相去甚远之地的节拍与步调起舞；但我们都获益于“古罗马人的贡献”（What the Romans Did for Us），获益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技术的探究，获益于印度风味料理烹饪方法（比如说目前最受英国人喜爱的外卖食物），获益于美国文学和法国的平等（*égalité*）的理论，并且在约翰·莫蒂默（John Mortimer）去世之后，我们尊重他的提醒，关心陪审审判、无罪推定和公民自由的发展（见《心愿所在》，*Where There's a Will*, 2003）。本真性永远是一种迷惑人心的特性，它常常在处于对变化的焦虑阶段出现，但历史却告诉我们，城市生活其实是有关混合文化形式的创造。

不过，不同文化被聚集在一起的速度以及导致它们共存的境况不总是有助于城市文化的相互渗透。的确，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他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 1998）中表明，在允许文化相互熟悉并适应的过程中，本就不够充足的时间业已流逝。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Franklin, 2003），他认为“城市环境持续地生成一种奇妙的混合，‘混合的友爱’和‘混合的恐惧’（mixophilia and mixophobia）。”在鲍曼看来，在过去，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熟悉，经过